

小城鎮經濟與資本主義萌芽： 綜論近年來大陸學界有關明清市鎮的研究*

劉石吉**

本文是一篇書評論文(Review Article)。全文分爲三部分，首先重點論述及檢討最近幾年中國大陸「對內搞活經濟，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揭櫫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強調城鄉經濟體制改革、發展商品經濟及市場體系、重視小城鎮經濟功能等的主要理論背景。其中以費孝通爲首的中共官方及學者，對於江蘇小城鎮研究的倡議最爲積極與致力，因而帶動了學界在過去幾年內再度對小城鎮的社會意義與歷史發展的探討。本文第二部分即集中檢討及評論史學界如傅衣凌、樊樹志、王家範、蔣兆成、陳學文、洪煥椿、陳忠平等人對明清江南市鎮與資本主義萌芽關係的研究，並嘗試以本文作者前此相關之研究略作比較分析。最後爲附錄參考書目，詳細列舉大陸學者關於小城鎮商品經濟的主要著作、有關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論著及資料選集、中外學者相關的重要研究成果等。

- 一、中國大陸近年來關於小城鎮商品經濟的理論
 - 二、綜論大陸學者對於明清江南市鎮與資本主義萌芽關係的研究
- 附錄、有關小城鎮經濟與明清市鎮研究的重要參考書目

*本文英文初稿曾在「全美中國研究協會」(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1987年年會中宣讀(1987年10月25-27日，美國華府)。作者特別感謝許倬雲老師、馬若孟(Ramon H. Myers)教授、居蜜博士、何漢威博士及兩位審查人的協助與批評。

**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研究員

一、中國大陸近年來關於小城鎮商品經濟的理論

(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的商品經濟與市場體制

一九八七年十月廿五日，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全大會上提出「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中，指出：中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而這樣的一個歷史階段，却不是泛指任何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都會經歷的起始階段，而是特指中國在生產力落後，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這個階段，他以爲「是逐步擺脫貧窮、擺脫落後的階段；是由農業人口占多數的手工勞動爲基礎的農業國，逐步變爲非農產業人口占多數的現代化的工業國的階段；是由自然經濟半自然經濟占很大的比重，變爲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階段；是通過改革和探索，建立和發展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體制的階段。」爲了解決當前的主要矛盾，就必須大力發展商品經濟，提高勞動生產率，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並且爲此而改革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部分。這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重要指導方針之一是：

必須以公有制爲主體，大力發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生產社會化、現代化的必不可少的基本條件。在所有制和分配上，社會主義社會並不要求純而又純，絕對平均。在初級階段，尤其要在以公有制爲主體的前提下發展多種經濟成份，在以按勞分配爲主體的前提下實行多種分配方式，在共同富裕的目標下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¹

事實上，這些發展「商品經濟」、「按勞分配」、「多種經濟成份」、「多種分配方式」、「先富起來」等論點，在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大三中全會後，已經陸續出現在黨的文獻中。（于光遠，1987：74—77）例如：一九八一年七月「國務院關於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干政策性規定」中，已使用了「多種經濟成份」這名詞，其意實指非社會主義（也就是資本主義）的經濟成份。一九八二年中共十二大的報告「關於堅持國營經濟的主導地位和發展多種經濟形式的問題」一節中，更指出「只有多種經濟形式的合理配置和發展，才能繁榮城鄉經濟，方便人民生活」；一九八四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則揭開了「在國家政策和計劃的指導下，

實行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的方針，堅持發展多種經濟形式和多種經營方式。」而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二屆六中全會「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中，也明白指出「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不但必須實行按勞分配，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和競爭，而且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還要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發展多種經濟成份，在共同富裕的目標下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于光遠，1987：75)

這就是上述趙紫陽「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下的商品經濟理論的主要根據。但是這種商品經濟的發展，雖然是實現生產社會化、現代化的「必不可少的基本條件」，却與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性質不同。趙氏的報告中說：

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它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本質區別，在於所有制基礎不同。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為在全社會自覺保持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提供了可能。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善於運用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這兩種形式和手段，把這兩種可能變為現實。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市場的發育和完善，利用市場調節決不等於搞資本主義。²

在十二屆三中全會（1984年10月）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決議中，中共當局已經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理論依據。那麼這種「有計劃商品經濟」「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又是如何不同於資本主義市場體制呢？中共的理論作家們長久以來不斷地在探討「社會主義的市場」問題。他們認為在不同社會體制之下，市場不僅規模不同，而且在性質上也有所區別。在資本主義以前，由於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主要地位，所以交換有限，市場也很狹小。到了資本主義社會，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分工日益擴大，商品生產成為社會生產的主要形式，市場規模空前發展擴大。它在國內市場上所進行交換的各種商品，主要是由「無產者」生產而為資本家所占有，表現出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這種市場是道道地地的資本主義性質的市場。蓋因資本主義統一的國內市場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先決條件；資本家生產商品，其目的是為了獲得更大的剩餘價值，而其實現則必須通過市場，把商品銷售出去。所以資本家總是千方百計，剝削無產者；在激烈的自由市場競爭中實現商品價值，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但是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市場是不斷擴大的市場，同樣能夠達到資本主義市場的規模

和速度。儘管當前中國的商品經濟不發達，但是，「隨著四化建設的進程、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完全能夠使市場不斷擴大，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進行發展。由於社會分工的日益發展，生產社會化使國民經濟部門聯結成爲一個有機的整體，要求有計劃的統一市場有了可能，因而商品交換的目的，都不是爲了剝削他人，而是爲了滿足各自生產和消費的需要，體現了社會主義的經濟關係。」所以，儘管目前中共存在著各種不同的「經濟成份」及「所有制形式」（其實是資本主義的經濟成份），在商品交換中產生矛盾，但是，「由於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使他們之間在根本利益上却是一致的相互合作的關係，而不是資本家和生產者那種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因此，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市場是擴大的、統一的市場、有計劃發展的市場，也是表現著社會主義經濟關係的市場。³

根據以上的簡要敘述，雖然中共當局及深受馬克斯主義經典影響的大陸政經學者，一再剖析及辯論這種「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所揭櫫的計劃商品經濟、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多種經濟成份、多種所有制形式等各色各樣、感染著「資本主義毒草」的理論，以爲這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⁴但毫無疑問地，這些論調已經與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社會經濟的發展階段理論（亞細亞生產方式或原始氏族公社、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有所修正補充，甚至矛盾衝突。這種「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下的商品經濟發展的論點，似乎可以從三十年來大陸學界喧騰一時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中，尋索其中相關相連的理論脈絡，也實在大可從學術史的觀點加以探討。這一個大課題，筆者希望日後能爲文詳加分析，此處僅略作理論背景之描述，做爲以下評論中國大陸學界目前有關小城鎮經濟的研究旨趣以及明清市鎮研究作品的基礎。⁵

（二）、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小城鎮研究（兼論費孝通）

最近幾年，由於「四個現代化」的進行，商品經濟及市場體制的強調，以戶營爲主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專業戶的發展，小城鎮的建設等，再度成爲中共當局與學術界熱烈討論的主題。一九七八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糾正了「左」的路線以後，商品經濟發展較快，城鄉之間的聯繫也越來越緊密，越趨於一体化。一九八四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更作出了「城市經濟体制改革」的戰略決策。

此種經濟体制的全面改革，逐漸推進了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最近中共當局採取一系列加速農業發展的措施，意味著勞動生產率提高，產業結構變化，農民收入增加，為小城市和城鎮發展提供了剩餘勞動力、資金、工業原料和生活必需品以及市場。地方交通網絡及其他區域基礎設施的發展，也加速了農村的繁榮，而作為網絡節點的小城鎮隨之發展起來。農村促進小城鎮發展，而小城鎮的發展，又可帶動農村發展。商品交換的產生和發展，是市場的基礎；而農村市場的繁榮，又是小城鎮經濟發展的基礎。中國傳統的農村市場基本上集中在小城鎮，它是區域內農村的政治、文化、技術的中心，也是經濟的中心，尤其是商品流通的中心，幾乎全國所有的農村商業網點都集中在小城鎮上，成為工業品下鄉的據點，農副產品的集散中心，集市貿易的場所。因此要充分發揮農村市場作用，就要以小城鎮為依託；發展小城鎮，建設好小城鎮，使小城鎮市場真正成為加速商品流通的紐帶和橋樑、市場體系的核心。⁶

「小城鎮」基本上是一個經濟的範疇，同時又是歷史的與社會的範疇。它是歷史上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受到生產關係的影響。由於小城鎮依賴於城市，尤其依賴於鄉村，所以在性質上介於城市與鄉村之間：它把城鄉兩個不同的區域，聯結成爲一個完整而相對獨立的區域；既是城市之尾，又是鄉村之首；是城市在鄉村的延伸，又是鄉村中的芻形城市，誠如費孝通所說的，小城鎮「是城鄉的紐帶，是城鄉發展的必要環節；又是一個調節城鄉人口的蓄水庫。」（費孝通，1984：237）亦城亦鄉，正是中國小城鎮的本質特徵。它反映在社會結構上，是農村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學技術、信息的中心，具有多方面的功能綜合體，又有大量的亦工亦農的勞動者，工作在城鎮，生活在農村。在經濟結構上，小城鎮是以城市為依託，具有城市工業、商業和社會服務的經濟功能，又有相當比重的農業和為農業服務的加工業。在空間結構上，它既有城市相對集中的人力、公共設施和建築群，又有接近鄉村的生態環境。簡言之，小城鎮具有雙重性：一旦小城鎮與城市結合，即具有城市的屬性；若與鄉村結合，則具有鄉村的屬性。它既是城市不可分的組成部分，也是鄉村的一個組成體，更是一個兩者兼優、相對獨立的社會、經濟、生態結合的實體。（徐榮安，1986：1-2）

一九八三年，中共紅旗雜誌副編審鄭宗寒，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試論小城鎮」一文，明白揭示「小城鎮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特別是社會分工和商品交換發展

的產物。發展小城鎮已成為農業結構合理化、充分利用農村勞動力、加強工農業商品交換、更好地發揮大中城市的作用和提高農民文化科學水平的客觀要求。」他更進一步指出「小城鎮」是一個總概念，其類型、性質和規模有很大的差別，因而具有各個不同的任務，「絕大多數縣城、縣屬鎮、公社集鎮的主要任務是為加速實現農業現代化服務，為提高農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服務。小城鎮是農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與農業關係極密切，打交道的是農民，它的興衰存亡緊緊地與農業聯繫在一起。此外，小城鎮在為城市大工業，為城市人民生活 and 為出口外貿服務等方面，負有重大責任。隨著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的發展，這任務日益增重，甚至上升為主導地位，尤其是處於大城市郊區的小城鎮更是如此。小城鎮是大城市的助手、科學技術的輔助中心和具有特點的工業生產基地，『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本質上是縮小的城市。」（鄭宗寒，1983）。可見小城鎮不僅是溝通城鄉商品經濟的紐帶，也是加強城鄉文化、科學、技術交流，加速農業現代化發展的一個重要陣地。「所以從歷史上剖析小城鎮的縱向發展和小城鎮由單一的產業結構向多樣化轉化，由單一功能向結合功能轉化的機制、特點及其規律，無疑更有特殊意義。」（杜受祜、張學君，1986：2）。而最近「江蘇省小城鎮研究會」更主張「小城鎮建設應以市場為中心，商品市場多樣化，大力發展各種專業市場，發展以橫向經濟聯合為主的商業形式，把小城鎮商業和市場搞活，形成縱橫交錯、四通八達的流通網絡。」（薛長順，1987）。

中國各地的小城鎮，大多具有悠久的歷史；它們主要是農民的農產品和手工業產品的交換場所，也有一些是著名土產的製造及集散地。自古以來，中國內地的農產品貿易較為普遍的形式，是以生產者之間的交換方式出現，在定期定地的集市（街、墟、場）上進行。日中為市，交換完畢後各歸其所，集上很少居民。隨著經濟發展，農村生產商品化程度提高以後，出現了以貿易為專業的商人，他們聚居在市上，開店營業，形成永久性的市鎮，這在宋代以來的中國南方各地，極為明顯。這種集鎮，是若干農村的經濟、政治、文化的中心，中心所聯繫的農村是它的「鄉腳」。集市貿易既有如此悠長的歷史，從來是農村商品交流的重要市場，是生產供銷的中間環節。如果農村是一個大細胞，集鎮猶如中間的核心，一個是「面」，一個是「點」，「點」把各個村落聯繫起來，形成一個社區，這社區中心就是一個集鎮。（費孝通，1984：219，1986：91）

但是，小城鎮的歷史角色，在中共統治的三十年間（1949—1978）的發展却被忽略了，被誤解為「資本主義的溫床」，把正當的商品流通當作「資本主義的復辟」，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以前，由於農村經濟的單一化，商品流通趨向國營化、封閉式的單渠道，集鎮上的商業因而蕭條下來，集鎮本身也就日漸衰落，而農村和小城鎮間千絲萬縷的紐帶給切斷了。小城鎮的經濟基礎原在農村裡，但中國農村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主要是生產國家需要的物資，即「統購統銷」和「徵購」的各類物資。除自給自足的產品外，幾乎不再生產能拿到市場上出賣的商品。國家收購的東西，也不是為農民方便著想，所以農民不再有商品生產的積極性。但隨著七十年代鄉鎮工業的成長，特別是一九七八年後「城鄉經濟体制改革」的蓬勃發展，奠定了集鎮發展復甦的經濟基礎。由於工業原料的採購和成品的銷售，均急切要求流通渠道的支持；隨著農村多種經營的發展，農村經濟已從自給自足和半自給生產，逐步走上商品生產的道路，以往那狹隘的單軌流動渠道已不能適應新的需要，集鎮上的商業活動開始了改變的契機。打倒「四人幫」後，中國農村發生巨變，農村繁榮的特徵之一即是由單一經濟進入多種經營；多種經營即包含了農產品的商品化。農民生產除上繳國家，夠自己吃外，還要尋找市場；商品市場的紐帶，即是集鎮這個流通渠道；農民有錢購物也要通過集鎮，是以集鎮恢復了做為往日農村商品集散中心的地位；它是農產品出售的地方，也是工業品進入的主要渠道。（費孝通，1984：221、228-229、235，1986：79）

江蘇省（包括上海市）是小城鎮衆多的省份，也是全國小城鎮最發達的地區（從小城鎮密度與平均非農業人口來觀察），據近年的估計，江蘇全省共有五十七個縣屬鎮和 1820 個農村集鎮，「社隊工業」70%集中在小城鎮上，縣辦工業則全部集中在各小城鎮。江蘇省小城鎮（市鎮）的發展有其長久的歷史，根據筆者前此以地方志資料的估計，明清兩代這地區的市鎮數量與規模均不斷地擴大，大致到十九世紀末期，江蘇境內已有一千餘個市鎮，其中頗多擁有數千戶至萬餘戶人口的巨鎮。（劉石吉，1978 b；鄭宗寒，1983；許學強等，1987）

江蘇省南部農村地處大中城市交通線的分劃區域之間，在文革動亂的夾縫中，它借助於大中城市的技術和原料，發展了一批鄉鎮企業（當時稱為「社隊工業」），

吸收了農村部分的剩餘勞力，這些鄉鎮企業一部分散在農村基層（即「大隊」，現稱為「村」），更多的則集中在小城鎮上。這種鄉鎮企業的產生和發展，使長期蕭條冷落的農村集鎮獲得了生機，也逐漸在縮短城鄉差距，緩和大城市的人口壓力；它根據各種工業的特點，分別將此社隊工業安排在城、鎮、鄉，構成了一個脈脈相通，以大扶小，以小協大的工業網。這種社隊工業，實在是繁榮農村的一條有效的道路，特別是在蘇南地區。費孝通認為這種社隊工業的發展過程及其對農村社會經濟的影響，以及正在形成的城、鎮、鄉一條脈絡的工業網和新的人口、社會、經濟的結構模式等，很值得進一步調查研究；他甚至認為這種「社隊工業」繼續發展下去，很可能逐步形成「中國特有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一種模式。」（費孝通，1984：208—214）

在半個世紀之前，費孝通就曾在江南吳江縣的開弦弓村做過田野調查，已初步注意到農村貿易與城鎮問題。1981年後，費氏多次對吳江縣境內的幾個大鎮，如盛澤、黎里、平望、震澤、同里、松陵鎮等，做了有計劃的調查，他得到江蘇省各級領導的全力支持，江蘇小城鎮的研究也被中共當局列為重點研究課題。1982—86年間，在他的倡議與領導之下，江蘇省成立了「小城鎮研究會」，結合了許多人力，有計劃的開展小城鎮的研究，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先後出版了小城鎮·大問題（1984）、小城鎮·新開拓（1986）兩本論文集和小城鎮區域分析專著；費氏自己的主要論文也收集在論小城鎮及其他（1986）、社會學的探索（1984）、費孝通選集（1988）等三本書中。

費孝通對於小城鎮的研究滿懷信心，他說「研究小城鎮問題，如果真是鑽進去了，這個領域實在太豐富了，這是個可以搞出國際水平的成果來的研究領域」。（費孝通，1984：238）他提出首先抓「點」，在點上取得經驗，再提到「面」上去。他把吳江縣小城鎮作為典型，進行解剖，他說：

我們研究小城鎮問題剛剛開始。我的願望是不搞大兵團作戰，對此我是外行。我願意搞典型的、深入的、直接觀察的並用定性在前、定量為後的調查方法，打算用二年，把小城鎮這些麻雀解剖出來。我們想搞一個合營研究，聯合大家的力量，對一個一個鎮進行解剖，直到弄清楚為止，然後把不同類型的鎮相互比較，搞清楚他們間的關係。我想進行的這次調查，將以我五十年前調查過的這個地區小城鎮為出發點。在此基礎上，通過觀察它在這段歷史過程

中的變遷，從中總結出一些經驗教訓來，由此也可探索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具体道路究竟是什麼樣的。(費孝通，1984：238)

1983年，費氏帶領研究人員到吳江實地進行「解剖」工作。吳江是蘇南的一個縣，傳統手工業極為發達。七十年代以來，此地的鄉鎮企業迅速發展起來。吳江城鎮很多，僅縣屬鎮就有七個，另有公社鎮（鄉鎮）十六個，村鎮十二個，合計三十五個，其中有衰落，也有新興的。(劉豪興，1988) 在費氏指導下，提出了「類別、層次、興衰、布局、發展」十字研究提綱，按不同類別層次，定點、定人、定題、分頭下鄉作實地調查，他認為：

吳江縣小城鎮有它的特殊性，但也有中國小城鎮的共性。只要我們真正科學地解剖這只麻雀，並擺正點與面的位置，恰當處理兩者的關係，那麼，在一定程度上點上的調查也能反映全局的基本面貌。吳江縣地處全國經濟最發達地區之一的蘇南，我們以吳江小城鎮為調查點進行深入分析，或許是觸到了小城鎮問題的塔尖。所謂塔尖是指吳江縣小城鎮建設的今天有可能是其他地區發展的明天；現在在這裡出現的問題有可能將來在別的地方也會碰到。假如我們對這些問題的發生、發展有一個科學的認識，那麼對不同地區今後的小城鎮建設無疑有其指導和參考的意義。當然，我們在開始時必須十分警惕，決不要忘記我們只是在解剖一只麻雀，而一只麻雀是不能代表所有麻雀的。

(費孝通，1986：14)

這是何等實事求是的精神，在此精神的感染下，江蘇省小城鎮研究會的工作有了豐碩的成果，也造成學術界對於小城鎮（特別是蘇南地區）的歷史變遷的研究，蔚然成爲一股熱潮。

爲了比較正確地掌握江蘇全省的小城鎮，1984年冬，費孝通更提出「捲地毯」任務，即在定性分析的基礎上，進行大範圍的定量研究。利用定量研究的指標體系及劃類選點的方法，在全省選了6個縣和190個小城鎮（約佔總數1/10）進行427項社會經濟指標的普查，取得大量數據，從而加深了對小城鎮的地位和作用及其發展規律的認識。(劉豪興，1988)

小城鎮是個大問題，它在中國大陸發展商品經濟，推行城鄉經濟体制改革，以及四個現代化建設中有其重要意義。透過觀察小城鎮的歷史發展過程，也可以觀察最近幾個世紀以來中國傳統的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性格特徵。在現階

段，發展鄉鎮企業，把小城鎮建設成大中城市及農村人口的「蓄水庫」，實為改變農村面貌，縮小城鄉差距、工農差距、實現四化的必經之途。如何開展和加強小城鎮的研究，總結小城鎮建設過程的歷史經驗，探求其發展規律，是社會科學的重要任務之一。費孝通抓住了小城鎮這隻「麻雀」，滿腔熱情地進行調查研究，揭示其中之問題與困難，實在是適時地賦予小城鎮科際研究以新的生命力量。

二、綜論大陸學者對於明清江南市鎮與資本主義萌芽關係的研究

中國大陸學者對於明清市鎮的研究，在最近幾年中有不少的作品問世。但在此之前，似乎只有 1950 年代末期、60 年代初期，討論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時，某些關於江南手工業生產關係的文章中，偶然作為論證的題材。其中惟一專論市鎮的文章是傅衣凌於 1964 年所發表的「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經濟的分析」（傅衣凌，1964）在此文中，傅氏首先肯定了這時市鎮的成長，不僅在數量上有所增加，而且在性質上也初步擺脫了族權、神權的羈絆，在一定程度上依附於當時的商業、手工業、商品生產、貨幣流通等的發展，而成為全國性市場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些市鎮的經濟活動有的已經超出了地區性限制，而和全國各大都市發生聯繫，可說已具有資本主義生產的「初步萌芽」。

但是，傅氏在此文中主要提出一個大問題：明清江南市鎮的工商業不斷發展，可是為什麼它不像歐洲封建社會末期北義大利、佛蘭德斯（按即 Venice, Genoa, Flanders 等地）諸城市那樣，獲得了城市自治權，確立了商人法、市民憲章以及市民免稅、商業自由諸種特權，而是長期停滯並處於封建經濟的附庸地位，成為地主經濟的補充呢？他試著從十七世紀前後江南市鎮內部的社會階級構成進行分析。主要論點如下：

明清市鎮成長和當時商品生產的發展是分不開的，但由於中國封建經濟沒有發展到很成熟的程度，自給自足的經濟仍占支配地位，所以這時的市鎮經濟，既具有工商業的性質，又具有農業的性質。江南市鎮的手工業生產，有相當多部分仍屬於

農家副業性質，農業與手工業結合的自然經濟性質極為凸出。農民爲了繳納租賦、維持家計，不得不從事小規模副業活動；這樣，擴大再生產便不大可能。當時江南市鎮的繁榮，大部分即以居間的商業爲主，如牙行、布號等。它們的廣大社會基礎，不外收購農家副業產品或其他小生產者的製成品；它的牟利方法，採取不等價的交換，直接榨取生產者的農民。在此情況下，商人便可以從流通過程中，攫取巨大商業利潤，不必急於直接從事生產的投資和技術的改良，從而疏遠了生產。於是，真正的手工工場便難以發展，縱使有一些手工工場，只不過是紡織品加工的染坊、踹坊而已。如此，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對於生產者的腐蝕作用，大大超過了它在積累資本方面所應盡的歷史任務。影響所及則是市鎮工商業經濟、社會基礎非常脆弱，不易立於獨立地位發展。

從人口構成來看，市鎮中工商人口占有一定的比重，但其中有部分的工商業者原爲鄉居的經營地主或商人地主。不少地主兼營商業或從事手工業生產。這些鄉居地主住在市鎮中，既進行商品生產，又從事農業經營，促進了農村中廣大的雇傭勞動者的成長。但是地主經濟的剝削基礎仍奠基於租佃關係上，且又和高利貸結合，因此市鎮就不可能成爲封建經濟的對立物而獨立發展。這是中國不易走上像北義大利與法蘭德斯諸城市那樣發展道路的一個主要社會障礙。同時，這些市鎮的周圍完全是自給自足的農村，處於自然經濟包圍中的市鎮，它們之間的經濟活動，很自然的越接近於純封建的方式；長期以來，中國的市鎮始終是作爲地主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存在著。

由於中國封建經濟的不平衡發展，資本主義生產的萌芽，亦不過稀疏出現。在強大封建勢力包圍之下，江南市鎮的發展原型，其創市者有地主，有官僚，也有宗族集團，帶有濃厚封建的、宗法的色彩。對於市鎮的實際支配權不屬於工商業者，而是屬於地主階級。市鎮不可能成爲新秩序的建立者；市民經濟的成長受到嚴重的壓迫。如此，中國的工商業經濟，在城市中既受到國家政權及行會制的壓迫，在縣治以外的市鎮，又遭受到地主階級的干涉。在當時強大的封建勢力包圍中，江南市鎮經濟雖有所發展，但尙未能突破宗法與封建的羈絆而獨立前進。這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發展遲緩的一個基本原因。（傅衣凌，1964）

以上是傅文的主要論點。由於傅氏在明清經濟史研究上的開創性地位，其論點自然成爲以後討論江南市鎮的一個（可能是惟一的）典範。在此文中，傅氏固然指

出江南市鎮「已具有資本主義生產的初步萌芽」，但他更為強調的却是：江南市鎮是傳統地主經濟的一部分，其經濟活動仍然是封建式的。這與筆者從商品經濟的觀點來探討江南市鎮的興起，並輔以數據證明，在方法上與結論上，可說大異其趣。

當前中國大陸從事明清江南經濟史研究的學者中，復旦大學的樊樹志可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明代江南市鎮研究」是這個領域中的傑作。（樊樹志，1983）在此文中，他開宗明義指出「市與鎮作為地理概念和地理實體，是社會經濟發展到某種特定階段的產物，集中地體現了經濟形態的新變化，他們是伴隨著農業生產、手工業生產和商品經濟的發展而興起，而發展的。」他進一步指出市鎮做為新興的經濟中心，與縣城、府城等傳統城市相比，較少保守性和因循守舊性，這可由明清兩代資本主義萌芽大量集中於市鎮中，得到有力的證明。所以市鎮在鄉村城市化過程中、在明清兩代經濟、文化發展過程中的歷史地位，不僅無法忽略，而且常是縣級以上城市所無法抗衡的，長江三角洲的市鎮網絡尤其明顯。這種市鎮發展的盛況，反映了明清間——特別是從萬曆到乾隆時期，這地區農業生產、手工業生產和商品經濟仍具有某種上升的趨勢。（樊樹志，1987 a）

樊氏特別強調市鎮的網絡體系。他認為市鎮在此並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互相聯繫依存，形成一個市鎮體系，溝通各地理層次：村、鄉、市、鎮、縣、府間的商品交流上，顯出了單個市鎮所無法呈現的特殊功能。明清長江三角洲經濟區在全國舉足輕重的地位，不僅在於它是國家的財賦重地，而且在於商品經濟水平發展形成的市鎮網絡所產生的經濟活力。甚至可以說市鎮網絡是這一經濟區的骨架；沒有市鎮網絡，就不可能保持名列前茅的經濟地位，也不可能把這一地區的經濟納入全國市場中。（樊樹志，1987 b）

市鎮的結構與功能也是樊氏所討論的主題。市鎮上有收購四鄉農民農副產品的各種商行，如絲行、花行、布莊；有成為客商與農家之間交易中介者與斡旋者的牙行，以及操縱牙行的牙儉、行霸；有供應四鄉農家消費品的各種店鋪，以及製造農具、各種器物的手工作坊；還有作為市鎮必不可少的附屬物的茶樓、酒肆，這種結構體現了市鎮作為一個商業中心的特殊功能。又由於市鎮具有商品集散功能，又位於水陸交通要道，因此依附於市鎮為商販從事搬運的腳夫為數眾多，且往往結黨聚伙，形成某種社會集團，這些都構成市鎮不同於鄉村的特色。其社會風氣、習俗也

迥然各異，茶肆遍於市鎮，賭博風盛，地棍遊食之徒日多，因此市鎮的寄生性日漸增大。

但是樊氏仍然不能避免地強調江南市鎮的時代限制性格。他認為市鎮經濟的自給自足、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狀況仍然牢不可破；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政治結構，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與土地頑固結合的經濟結構仍是一種強大的阻礙。十九世紀中葉後，農業商品化的內在障礙與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使得大批市鎮衰落了。

綜言之，樊氏注重江南市鎮的社會結構、網絡体系以及市鎮在鄉村城市化過程中的歷史意義，實頗有見地；但最後帶上一筆「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因素，却又顯得馳騁議論、言過其實了。

王家範在「明清江南市鎮結構及歷史價值初探」（王家範，1984）一文中，也特別強調市鎮結構和市場網絡。但他認為「市鎮和城市是很不相同的」，這是因為城市是由政權的力量，政治上的原因，由上而下所形成的，消費對象主要為貴族階級；市鎮則主要由於經濟的原因，即鄉村與商品經濟聯繫的擴大，由下而上所形成的。固然市鎮的消費對象中地主階級占相當比重，但市鎮必須與其四周的鄉村發生雖然是零星的、小額的，但總量却很不小的交易。是以市鎮的形成不是以府縣城為中心向四周幅射，而却往往在離府縣城比較遠、與鄰府縣交界的地區率先出現；所以市鎮的產生與農村經濟的發展和需要關係極為密切。從戰國秦漢的「都市」，經東晉隋唐的「草市」，發展到宋明的「鎮市」的過程，既典型地反映了商品經濟先是集中於城市，而後向鄉村伸展的橫向進步；同時標誌著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逐步克服前期的病態，把基礎建築在農副業經濟發展之上的縱向進步。這批市鎮的崛起，帶來的是先進地區江南農業經濟顯著發展與經濟結構變革的重要訊息；顯示著農業與手工業間以及它們各自領域內專業分工的擴大，鄉村人口向市鎮轉移；區域經濟與市場網絡的形成等引人注目的變革迹象。儘管這些還不能完全與資本主義萌芽相聯繫，但無疑是封建社會正向新的進程變化的信號。

王文在結論中特別檢討了江南市鎮的歷史意義與研究課題，頗有所見。他認為明清江南市鎮本身具有「兩重性」——處在中國封建社會瓦解、資本主義產生的新舊質變過程中。過高地估計其歷史價值，處處與資本主義萌芽相聯繫，實有許多現象難以解釋。例如被認為是資本主義萌芽重要標誌的手工作坊，在江南市鎮實際「寥

若晨星」，城鎮和四鄉農村的家庭手工業和副業却如「汪洋大海」。又如絕大多數江南市鎮只是農村集鎮，商業規模狹小，也很難直接與資本主義萌芽相連。但是，能不能因為他們帶有種種封建特徵而全盤否定其歷史價值呢？實際上，農業生產的高度發展，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前提之一；家庭手工業也不是不能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聯結。所以王氏以為應該從舊痕迹中看到新氣息，承認江南市鎮的歷史意義。從歷史動態的角度，表明先進的江南地區，如果沒有封建專制主義的摧殘壓抑，是最有希望產生資本主義的。（王家範，1984）

王家範把市鎮看成與傳統城市絕然不同的新生事物，恰與傅衣凌將市鎮當做封建地主經濟的一部分的看法，顯出極端的差異。王氏的看法相當有見地，雖然他多少忽略了傳統城市「非行政機能」的強化，也就是宋代以來坊市制的破壞、商業機能日益發展的現象。他所強調江南市鎮的「兩重性」——由舊質漸轉變為新質的過程、一種「舊的因素拖住新的因素」的過渡性質，事實上也是中國大陸學者討論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發展時，所共同強調的。蔣兆成的「明清時期杭嘉湖地區鄉鎮經濟試探」一文，（蔣兆成，1986）更充分發揮此義。他認為浙西杭州、嘉興、湖州三府的鄉鎮具有兩重性：一方面是農村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集聚點，起著分解封建經濟的作用，因而是資本主義萌芽的發源地；另一方面，這些鄉鎮是在封建農村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同封建政治經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它可說是「封建國家和宗法勢力在農村中的統治據點」，而且尚未完全擺脫自然經濟的束縛和支配，故其發展是不穩定的，具有明顯的歷史局限性。蔣氏以這批明清浙西「封建市鎮」的個案分析為基點，用來解釋「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蔣兆成，1982）其主要論點，與前引傅衣凌等文，實異曲而同工。

明清兩代浙西三府的市鎮發展，近年來成為學者所特別探討的對象。⁷浙江社會科學院的陳學文尤其對嘉興府的市鎮經濟發展，下了極大的工夫。1985年出版，由陳氏負責主編的嘉興府城鎮經濟史料類纂，蒐集了相關的文獻資料與實地勘考所得的碑刻資料，可說是第一本比較完整的江南市鎮資料選輯。陳氏認為嘉興地區的市鎮經濟，是「江南最為典型的地區」；嘉興市鎮在當時社會經濟發展中起了很大作用，成為大中城市與廣大農村的聯絡樞紐；它們是城鄉經濟交流的通道，推進了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也促進了自然經濟的逐漸瓦解，資本主義生產因素在此首先獲得萌芽。嘉興經濟發展處於全國先進地區，與眾多市鎮的存在是極有關係的。他對

嘉興境內的大鎮如濮院、烏青、雙林鎮等進行了一系列的個案研究，從而肯定這些市鎮已經「較明顯地存在著資本主義的萌芽」：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與社會分工的擴大而產生，大批市鎮群的出現正是標誌著從商品生產向資本主義生產的逐漸過渡，並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只是因為社會條件諸多限制，始終只能停留在萌芽階段，這大約延續了二百多年（萬曆到乾隆，1573—1795）的歷史。（陳學文，1985 a, 1985b, 1986）

對江南市鎮的經濟結構作較全面與綜合研究的是南京師範大學的青年學者陳忠平。1984年他向南京大學所提交的研究生畢業論文「江南市鎮經濟結構研究」（指導教授洪煥椿），是研究江南市鎮社會經濟結構的傑出作品；此外，他也為文論述徽商與閩粵商人等客商在江南市鎮的活動情形。（陳忠平，1985，1987）陳君將江南市鎮依其經濟結構分為三類型：生產性市鎮、流通性市鎮與消費性市鎮。主要論點敘述如下：

明清江南市鎮中，基本上都有普遍的家庭手工業和發達的各類小手工業。這些手工業雖然還只是家庭的副業生產或小作坊生產，但已是很少依賴、或基本脫離農業的專業化生產，反映了市鎮手工業與農業間較高分工水平。在這種分工發達的基礎上，還形成了以專門性手工業生產為主要經濟內容、以小手工業者為主要居民的「生產性市鎮」，這些市鎮成為民國時期一些江南市鎮近代工廠得以建立的基礎。作為農村的手工業生產中心，市鎮不僅以農村為原料供應基地，或以農村為產品市場，為農家進行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加工、生產，而且通過手工業生產技術的傳播與影響，推動了周圍農村專業化手工業生產區域的形成。隨著農村居民家庭手工業生產的擴大與發展和近代一些市鎮手工業的衰落，這些原有的「生產性市鎮」內部商品生產意義相對下降，而商品流通的功能不斷增長，大多轉為與農村經濟關係更為密切的「流通性市鎮」。同時，以封建統治階級及軍隊消費性活動為主要內容的「消費性市鎮」，由於市鎮內部縉紳地主勢力的普遍衰落和城防軍事色彩的減褪，並由於市鎮內部商品流通和商品生產功能的增大，這類市鎮也逐漸轉化為「流通性市鎮」。

構成市鎮經濟基礎的是流通商業。這種流通商業主要不是以市鎮本身的商品生產為基礎，也不是以市鎮手工業品同農業品交換為主要內容；而是以農村的商品化生產為基礎，以農村的商品集散、轉輸為主要內容；市鎮經濟因而與農村經濟關係極為密切。這種商品流通乃成為明清江南市鎮普遍具有的經濟功能。隨著生產性、

消費性市鎮的轉化，流通性市鎮又成爲江南市鎮的最基本類型。這類市鎮作爲地區經濟的聯繫樞紐，滿足了各個地區集中的生產、消費要求。於是市鎮的商業流通活動，與當地農村及不同地區間的生產消費活動，形成了連鎖的經濟關係，市鎮就成爲社會再生產總過程中不可分割的經濟環節，並由此推動著農村社會分工的擴大和商品經濟的發展。

透過市鎮的商品流通，形成了聯結江南農村與城市、江南地區與其他地區的經濟網絡體系，構成了國內市場的組成部分，也有力地促進了江南農村社會分工擴大和商品經濟發展。近代以來，它又爲外國資本和買辦資本所控制，因而被納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體系，把江南農村經濟進一步捲入外國資本及買辦資本支配下的市場經濟漩渦中。

江南市鎮畢竟是在封建統治力量比城市薄弱的農村中發展起來的，因此，市鎮的經濟活動較少受到封建國家的干涉和控制，地主階級對市鎮的影響也主要是採取經濟的形式。由於市鎮中生產和銷售活動的競爭不如西歐中世紀城市那樣激烈，市鎮工商業者也沒有產生像中世紀城市市民那樣反抗封建領主掠奪的聯合要求，沒有形成手工業的行會組織。作爲商人的行會組織——同業公會也只在清末才出現於江南少數大鎮中。相對於西歐中世紀城市和中國封建社會城市，市鎮就顯得有一個更爲自由的工商業活動天地。以自然經濟爲基礎的封建經濟結構因而受到衝擊而發生解體；新生的、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關係則不斷發生並發展起來。

但是，作爲市鎮物質基礎的生產活動，主要還是一種直接目的表現爲交換價值，終極目的表現爲使用價值的、由生產者和生產資料緊密結合的小生產。這種在封建制度下發展起來，並爲其服務的商品化小生產的封建性質，決定了建立於其上的生產性、流通性、消費性市鎮只能在封建經濟規律的支配下進行經濟活動，工商業仍難得到自由發展。市鎮的手工業受到內部資金微弱、生產狹小的家庭手工業者、獨立的小手工業者簡單再生產的局限，難以得到進一步擴大。市鎮的商人資本則由於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牢固結合及普遍的牙行制度，難以進入生產領域以直接組織和擴大生產；此外，這些市鎮的工商業還多少受到封建統治者的操縱及影響，難以得到正常發展。總之，在鴉片戰爭以前的江南市鎮中，封建的經濟結構已經發生著解體，但是進行得非常緩慢；資本主義關係的萌芽也已破土而出，但是表現得十分幼弱，還不足以動搖整個封建統治的根基。江南市鎮在鴉片戰爭前後所經歷的重大變

化，是在由傳統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到半封建、半殖民地近代時期的歷史過程中，整個江南地區社會經濟發展與變化的縮影。(陳忠平，1984)

陳君的論文運用了大批的地方志資料，其中有幾種市鎮志頗為珍貴；資料的掌握堪稱完整。近年來他又負責主編中國城鎮史論著資料索引，對於相關論文瞭然於胸，尤屬難能可貴。他的論文主題擺在市鎮的社會經濟結構，很能顯出細緻工夫；將市鎮類別為生產性、消費性及流通性市鎮，也很新穎，這些都是筆者前此有關江南市鎮的論著所忽略的。但陳君全文缺乏一個整體的結構，其結論部分有幾點已經偏離正文的論證根據。由於全文缺乏完整的統計數字與量化分析，讀者僅能觀察到市鎮的「質變」，却見不到「量變」的任何數據。顯然，傳統「經典作家」的理論，限制了他對其他社會科學理論的運用。假如他能稍微涉獵 G. William Skinner 及其他城市研究的著作，想必更能充實本文的論證基礎。當然，這對陳君及其他中國大陸學者，在短期內可能只是一個苛求。

陳文最後討論到江南市鎮與資本主義萌芽的關係。他認為鴉片戰前江南市鎮的封建經濟結構已逐漸緩慢的解体，同時資本主義的萌芽也已破土而出，但仍非常幼弱，還不足以動搖整個封建統治的根基。本文以上所評介的其他作品中，也幾乎是同一個論調。江南市鎮中雖然已具有資本主義的初步萌芽，但基本上，市鎮中商品經濟的成長仍然與農業經濟分不開，市鎮中的手工業生產也是與農業生產相結合的自然經濟性質。地主、官僚、商人三位一体的社會結構，與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的結合，均使得市鎮中的手工業作坊沒有進一步擴大生產的可能。處於強大地主階級控制下的江南市鎮，其商品經濟雖有所進展，但却始終未能突破宗法與封建的羈絆而獨立前進。十九世紀中葉後，外國資本主義入侵更使得江南市鎮中衰，資本主義萌芽發展更無所依恃了。(參閱附錄[二])

長久以來，有關「資本主義萌芽」這個命題在學術界引起了極為熱烈的爭論。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明清時代已經有了資本主義關係的萌芽，那江南市鎮無疑是最重要的發源地之一；如果明清時代的中國沒有或不能發展出資本主義的萌芽，那顯然問題的癥結主要是在江南市鎮中。換言之，江南市鎮是資本主義萌芽的溫床，沒有江南市鎮，明清時代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也就沒有可靠的據點。筆者前此有關江南市鎮研究的初步結論，可以和以上諸家說法做一對照比較，從而更清楚肯定江南市鎮的歷史意義。(參閱附錄[四])

1950年代末期大量討論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著作(參閱附錄[三])，主要集中在手工業部門，並沒有特別把江南市鎮做為問題的基點來探討，只有在極少數的文章中偶爾觸及。1980年以來，學術界對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再度掀起一次高潮。近年來，先後出版幾種關於資本主義萌芽的論文集(附錄[三])，都相當的膾炙人口。這些論著的主題集中在幾方面：或是就個別地區與個別市鎮從事專題研究；或是對各個手工行業，分別進行調查研究。這種對史料的調查整理與實地勘考，引起學界極大的重視，其成果是先後出版了幾種碑刻史料。此外，根據檔案資料，從事明清農業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也有了可喜的成果。同時，科學的實証研究，運用數據資料，從事量化分析，也逐漸用來探討明清兩代的國內市場問題。1985年 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 (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一卷) 的出版，正是就這個大問題，做了一個三十年研究成果的總結。(許滌新、吳承明，1985)

以上這些前人的努力成果，將可對吾人從事明清資本主義萌芽及江南市鎮的研究、或兩者之間相互關係的研究，提供堅實可靠的史料基礎。明清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如何在分析方法與理論層次上，早日擺脫「萌芽」階段，邁向更為成熟的境地，是我們當前的嚴肅課題。

註 釋

1. 以上引文，見趙紫陽，「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87年10月25日)，人民日報，1987年11月4日。
2. 趙紫陽，人民日報，1987，11，4。並參考厲以寧，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頁49—61；魯凡之，中國經濟改革與調整，頁58—62；于光遠，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頁5—49，339—410。
3. 以上綜論及引文，散見徐榮安，中國小城鎮經濟學，頁223—231。
4. 關於這方面的文獻及論述，目前充斥於中國大陸的報章雜誌及其他出版物中。比較深入的論述可參見于光遠、厲以寧的作品。至於中共官方的論調，可以鄧小平，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書為代表。

5. 關於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參考本文附錄參考書目第三部份。
6. 參見徐榮安，頁 232；許學強、伍宗唐、梁志強，中國小市鎮的發展，頁 11—12。
7. 參見附錄所列陳學文、李國祁、石錦、蔣兆成等學者之著作。

附 錄

有關小城鎮經濟與明清市鎮研究的重要參考書目

(一)中國大陸學者有關小城鎮經濟的研究及資料集

于光遠

1987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中國社會科學，3。

1988 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于洪俊、寧越敏

1983 城市地理概論。安徽科技出版社。

江蘇省小城鎮研究課題組

1984 小城鎮·大問題—江蘇省小城鎮研究論文選(一)。江蘇人民出版社。

1986 小城鎮·新開拓—江蘇省小城鎮研究論文選(二)。江蘇人民出版社。

杜受祜、張學君

1986-87 近現代四川場鎮經濟志，第一、二集。四川社會科學院。

宋家泰

「論我國小城鎮的建設發展問題」，地理科技資料，18。南京大學地理系。

沈關寶、李友梅

1988 「鄉村企業的發展與城鎮化」，社會科學戰線，1。

浙江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經濟所

1985 嘉興府城鎮經濟史料類纂。浙江社會科學院。

浙江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南京大學歷史系

1984 中國城(市)鎮史論著資料索引。(稿本)

徐榮安

1986 中國小城鎮經濟學。中國展望出版社。

許學強、伍宗唐、梁志強

1987 中國小市鎮的發展。廣州中山大學。

費孝通

1984 社會學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 論小城鎮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7 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香港中華書局。

1988 費孝通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黃葦、夏林根

1984 近代上海地區方志經濟史料選輯，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

葉克林

1987 「綜論建立中國特色的集鎮社會學」，中國社會科學，5。

1988 「論集鎮社會學學科建立的基本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

鄭宗寒

1983 「試論小城鎮」，中國社會科學，4。

劉豪興

1988 「費孝通社會學學術思想述評」，中國社會科學，3。

厲以寧

1989 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中國展望出版社。

魯凡之

1981 中國經濟改革與調整。香港。

鄧小平

1987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香港三聯書店。

薛長順

1987 「如何發展小城鎮商業和市場？」，人民日報，1987年1月19日。

魏金玉

1988 「封建經濟、自然經濟、商品經濟」，中國經濟史研究，2。

嚴重敏

1964 「試論蘇錫地區農業發展與中小城鎮的關係」，地理學報，3。

(二)、中國大陸學者關於江南市鎮的研究著作

王家範

1984 「明清江南市鎮結構及歷史價值初探」，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

何榮昌

1985 「明清江南市鎮的發展」，蘇州大學學報，3。

吳仁安

1988 「從上海方志來看清代上海地區城鎮經濟的變遷」，華東師範大學學報，2。

林紹明

1987 「明清年間江南市鎮的行政管理」，華東師範大學學報，2。

范金民

1988 「明清杭嘉湖農村經濟結構的變化」，中國農史，2。

洪煥椿

1984 「評劉石吉先生的明清江南市鎮研究」，學術月刊，12。

秦佩珩

1984 「明清長江三角洲市鎮的發達與手工業的關係」，明清社會經濟史論稿。河南人民出版社。

陳忠平

1984 「江南市鎮經濟結構研究」，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論文。

1985a 「太湖流域市鎮名稱形成演變的特點及其規律」，南京師範大學學報，3。

1985b 「明清徽商在江南市鎮的活動」，江淮論壇，5。

1987a 「明清時期江南市鎮的牙人與牙行」，中國經濟史研究，2。

1987b 「明清時期閩粵商人在江南市鎮的活動」，學術研究，2。

1988 「劉石吉著『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述評」，中國經濟史研究，3。

陳學文

1981 「明代江浙地區市鎮經濟的發展」，溫州師專學報，1。

1985 「明清時期江南的一個專業市鎮：濮院鎮的經濟結構之探討」，中國經

濟史研究，1。

- 1985 「明清時期嘉興地區城鎮經濟的發展」，明史研究論叢，4。
1986a 「明清時期杭州府仁和縣三個市鎮的歷史考察」，歷史地理，5。
1986b 「明清時期雙林鎮的社會經濟結構之探索」，浙江學刊，5。
1987 「略論明中葉市鎮經濟的發展」，松遼學刊，2。
1988a 「明清時期江南巨鎮烏青鎮的經濟結構」，中國經濟史研究，2。
1988b 「明清時期南潯鎮的社會經濟結構」，浙江學刊，1。

傅衣凌

- 1964 「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經濟的分析」，歷史教學，5。

黃 葦

- 1979 「中國近代集鎮墟場的興衰存廢問題」，學術月刊，3—4。

葉依能

- 1988 「明清時期太湖地區市鎮發展之研究」，農業考古，1。

鄒農儉

- 1984 「明清時期太湖地區市鎮經濟初探」，小城鎮·大問題。江蘇人民出版社。

蔣兆成

- 1982 「剖析中國的封建市鎮—兼論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學術月刊，7。
1986 「明清時期杭嘉湖地區鄉鎮經濟初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

樊樹志

- 1983 「明代江南市鎮研究」，明史研究論叢，2。
1985 「明清時代的濮院鎮」，江海學報，3。
1987a 「市鎮與鄉村的城市化」，學術月刊，1。
1987b 「明清長江三角洲的市鎮網絡」，復旦學報，2。
1987c 「蘇松棉布業市鎮的盛衰」，中國經濟史研究，4。
1988a 「明清江南市鎮的實態分析—蘇州府吳江縣を中心として」，中國近代史研究，5。

1988 b 「明清江南市鎮の實態分析－湖州府を中心として」，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16。

(三)明清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論著與資料選集

上海博物館編

1980 上海碑刻資料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國人民大學編

1957 明清社會經濟形態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教研室編

1957 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上、下編。北京三聯書店。

江淮論壇編輯部

1985 徽商研究論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

江蘇省博物館編

1959 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北京三聯書店。

李文治、魏金玉、經君健

1983 明清時代的農業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吳承明

1985 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南京大學歷史系編

1960 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續編。北京三聯書店。

南京大學歷史系編

1981 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論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南京大學歷史系編

1983 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論文集。江蘇人民出版社。

洪煥椿編

1988 明清蘇州農村經濟資料。江蘇古籍出版社。

段本洛、張圻福

1986 蘇州手工業史。江蘇古籍出版社。

傅衣凌

1982 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許滌新、吳承明主編

1985 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張海鵬、王廷元主編

1985 明清徽商資料選集。黃山書社。

劉永成

1982 清代前期農業資本主義初探。福建人民出版社。

蘇州歷史博物館、江蘇師範學院、南京大學合編

1981 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江蘇人民出版社。

(四)、本文作者有關明清江南市鎮的論著

劉石吉

1978a 「太平天國亂後江南市鎮的發展，1865—1911」，食貨，7：1。

1978b 「明清時代江南市鎮之數量分析」，思與言，16：2。

1978c 「明清時代江南地區的專業市鎮」，食貨，8：6—8。

1987 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4 "Some Reflections on Urbaniz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Market Towns in the Lower Yangtze Region, ca.1500-1900," *The American Asian Review*, 2,1(Spring): 1-27.

(五)其他相關論著

石錦

1985 「明清時代桐鄉縣社會精華分子的社會組成和變化稿」，漢學研究，3：2。

李國祁

1977 「清末民初閩浙地區人口與都市化的演進」，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5。

- 1979 a 「溫州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教學與研究*，1。
- 1979 b 「清代金華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7。
- 1980 「十六世紀後期至廿世紀初期山東萊州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8。
- 1981 「清代杭嘉湖寧紹五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初稿」，*中山學術論文集*刊，27。
- 李龍潛
- 1982 「明清時期廣東墟市的類型及其特點」，*學術研究*，6。
- 1988 *明清經濟史*。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 范植清
- 1982 「鴉片戰爭前漢口鎮商業資本的發展」，*中南民族學院學報*，2。
- 段本洛
- 1986 「蘇州絲織手工業中資本主義萌芽的孕育」，*歷史學報*，1。
- 高王凌
- 1984 「乾嘉時期四川的場市、場市網及其功能」，*清史研究集*，3。
- 陳學文
- 1982 「明代杭州城市經濟的發展及其特色」，*浙江學刊*，5。
- 1985 「明代中葉江南一個縣份的社會經濟結構—浙江崇德縣個案研究」，*浙江學刊*，5。
- 「明代嘉定縣市鎮經濟結構的探索」，*平准學刊*，4。
- 梁庚堯
- 1983 「中國歷史上的城市人口讀後」，*食貨*，13：3—4。
- 1985 「南宋的市鎮」，*漢學研究*，3：2。
- 梁淼泰
- 1984 「明清時期景德鎮城市經濟的特點」，*南開學報*，5。
- 葉顯恩、譚棣華
- 1984 「明清珠江三角洲農業商業化與墟市的發展」，*廣東社會科學*，2。
- 趙岡、陳鍾毅
- 1983 「中國歷史上的城市人口」，*食貨*，13：3—4。
- 1986 *中國經濟制度史論*。台北：聯經公司。

樊樹志

- 1985 「十一至十六世紀江南農業經濟的發展－傳統經濟結構突破的局部考察」，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廣東人民出版社。

劉翠溶

- 1986 「明清時期長江中下游地區都市化之發展與人口特徵」，經濟論文，14：2，台北：中研院經濟所。

戴一峰

- 1985 「近代閩江上游山區初級市場初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3。

川勝守

- 1979 「中國近世都市の社會構造：明末清初江南都市について」，史潮，6。

小島淑男

- 1980 「清朝末期の都市と農村：江南地方を中心に」，史潮，8。

山根幸夫

- 1960 「明清時代華北における定期市」，史論，8。

加藤繁

- 1952 「清代に於ける村鎮の定期市」，支那經濟史考證。東京。

斯波義信

- 1961 「宋代江南の村市と廟市」，東洋學報，44：1-2。

- 1988 宋代江南經濟史の研究。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濱島敦俊

- 1986 「土地開發與客商活動：明代中期江南地主之投資活動」，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台北。

Elvin, Mark

- 1977 "Market Towns and Waterways: The County of Shanghai from 1480 to 1910," in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 Press.

- 1978 "Chinese Cities Since the Sung Dynasty," in P. Abrams and E. A. Wrigley (eds.), *Towns in Societies*. Cambridge Univ. Press.

Fei, John C. H.

- 1975 "The 'Standard Market' of Traditional China," in Dwight H. Perkins (ed.), *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tanford Univ. Press.

Rozman, Gilbert

- 1973 *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 Press.
- 1982 *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Settlements in Ch'ing China*. Cambridge Univ. Press.

Shiba, Yoshinobu

- 1975 "Urban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s in the Lower Yangtze Valley," in John W. Haeger (ed.), *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 Univ. of Arizona.

Skinner, G. William

- 1964-65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JAS*, 24. 1-2.
- 1977(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 Press.
- 1980 "Marketing Systems and Regional Economies: Their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Peking (Unpublished).

“Small Town Economy” and Incipient Capitalism in Ming-Ch’ing China: A Reappraisal of Rec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Shih-chi Liu

Abstract

This paper is designed to analyse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towns and the sprouts of capitalism in Ming-Ch’ing China through an overall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issue in question by mainland scholars.

Recently, with the launching of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nd academic community in mainland China have once again raised the issue of “small town economy”. As the economic importance of small cities and towns is acknowledged, a hot debate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rket town economy and incipient capitalism has been rekindled.

The efforts of these scholars have borne fruits. A solid foundation has been laid on which our studies of the sprouts of capitalism, and the market towns as well as their interrelations will be greatly facilitated. But, theories of Marxism, Leninism and Maoism may be more of a hindrance than a help as they have rendered mainland scholars unable to apply other social science theories to their studies. Concerning the study of Ming-Ch’ing economic history, at present, the real issue confronting us is: in terms of methodological 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level, how can we burst free from the “incipient stage” and come to a maturity?